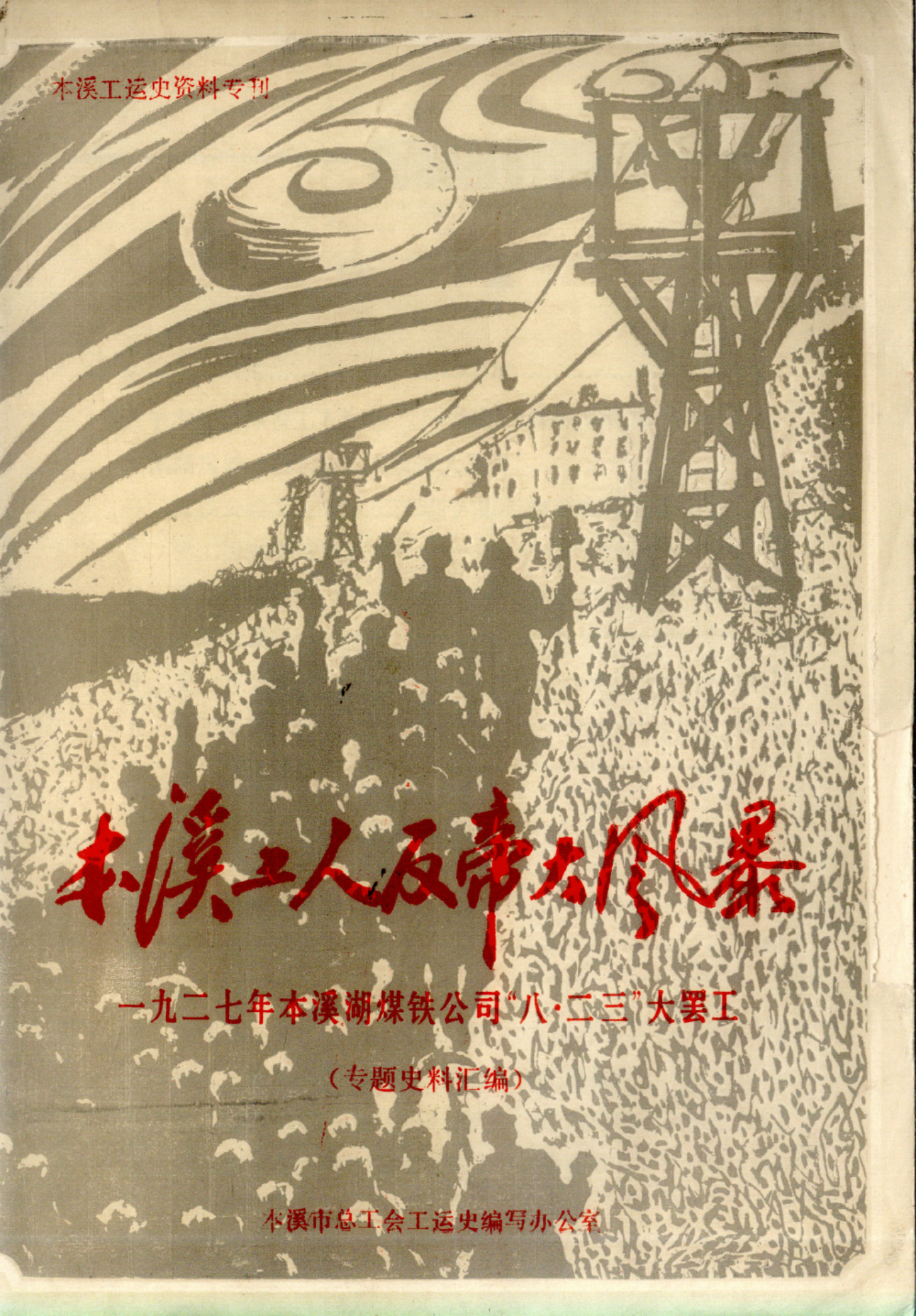




本溪工运史资料专刊

本溪工人反帝大风暴

一九二七年本溪湖煤铁公司“八·二三”大罢工

(专题史料汇编)

本溪市总工会工运史编写办公室

目 录

前言.....	(1)
关于本溪湖煤铁工人“八·二三”专题调查情况的 报 告.....	(2)
本溪湖煤铁（公司）工人反帝大风暴	
——煤铁公司工人“八·二三”大罢工始末的综述 报 告.....	(5)
1、罢工历史背景及原因.....	(5)
2、罢工经过.....	(12)
3、日军大暴行.....	(16)
4、中、日交涉.....	(19)
5、罢工结果.....	(26)
6、罢工意义及影响.....	(27)

《史料选登》

本溪县警察所长给杨监督的报告(附件1、附件2).....	(31—22)
本溪县知事的报告(附件3)	(33)
关于提交在押工人案	
本溪湖日警察署公函第5073号之四(附件4).....	(33)
《抚顺工人》第一期，关于全国总工会代表报告	
摘录(附件5).....	(35)
奉天省长莫德惠给张作霖的电京报告(附件6).....	(36)

《报纸选登》

日本当局重视本溪案（附件7—16）

《盛京时报》、《晨报》、《顺天时报》《申报》、
《益世报》、《庸报》、《民国日报》等报导选登……（36—48）

《访问·回忆录选登》

刘宰喜访问录（附件17）……………（49）

李椿章访问录（附件18）……………（50）

陈思保访问录（附件19）……………（51）

刘永山访问录（附件20）……………（51）

付林春访问录（附件21）……………（52）

朱起山访问录（附件22）……………（52）

回凤喜访问录（附件23）……………（53）

刘成库等九人的回忆（附件24）……………（53）

我所经历的1927年本溪湖煤铁工人“八·二三”

大罢工——杨纯义（附件25）……………（54）

※

※

※

封面题字	张春沛
封面设计	李哲
摄影	刘连峰 刘忠凯
责任编辑	郝树林
印刷单位	市总工会铅印室

★ 本溪市总工会工运史资料专刊·1985年10月

前

言

一九二七年，本溪湖(中日合办)煤铁公司四千五百多名中国工人举行了“八·二三”大罢工，日寇谓之“煤铁工人大暴动”。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后，继之党在东北南满地区几个主要城市，先后又领导了“大连福纺会社”和“奉天制麻会社”两大反帝罢工胜利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本溪湖“八·二三”反帝大风暴。它给当时反动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均以沉重打击。日寇承认是它入侵“满洲”(东北)以来前所未有的反日大斗争。无疑地它是东北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反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是中国工运史上的光辉一页。

本溪湖“八·二三”大罢工，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反压迫、反剥削、争生存的群众斗争，在军阀割据统治下的中日合办企业里，第一次公开提出“杀鬼”的斗争口号，矛头直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不畏强暴，在极度困难条件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为坚持革命斗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八·二三”大罢工的专题资料，在广泛搜集史料和既有访问材料的基础上，又做了补充和考证，力求把历史事件及有关资料立准、立实，以便为编写其他史志提供资料，对教育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好地振兴中华，建设本溪，进行传统教育提供本地区的乡土教材。

在这本专题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从始到终都得到市委地方党史征集办公室有关领导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对此专题资料的搜集工作还不够完备、对资料的取舍使用和编排上，由于我们理论水平和历史知识浅薄，加上缺乏经验，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和指正。

关于本溪湖煤铁工人“八·二三” 大罢工专题调查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本溪湖（中日合办）煤铁公司四千五百名中国工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统一行动和指挥地举行了当时震惊中外的“八·二三”大罢工。它是二十年代中国东北工人三大罢工之一，也是较为突出的反日爱国政治斗争。

“八·二三”大罢所发生的年代和社会背景及其当时的环境，都是比较复杂的，本溪煤铁工人处于军阀张作霖统治下，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所谓中日合办煤铁公司。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受尽了帝、官、封三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在中国的南方，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分裂，全国人民革命趋向低潮。此时，新、老军阀勾结，张作霖趁机“釜底抽薪”用意“联蒋反共”，妄图彻底挤垮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加紧了对我东北的侵略。久受日、张压迫的东北人民深感东北的危亡，迅速掀起了反抗斗争。“八·二三”本溪湖煤铁工人举行了反日大罢工，高呼“杀鬼”的口号！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反帝、反奉运动的积极领导者和组织者，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只要有一个共产党人，就会领导和组织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根据这一历史事实，它将是我们的工运史料征集内容之一，中共辽宁省委、本溪市委都把“八·二三”事件，作为我市的重点征集资料加以专题整理。

市总工会按照市委下达的专题任务和要求，在二年前即着手进行专题材料的搜集工作。并以中共本溪地方党史编委办，早在一九六一年，所征集的资料，为这次核实的基础史料，进而我们又多方查阅了中央、省、市档案馆、图书馆、全总资料室和沈阳、抚顺、大连等市党史资料以及早期报刊、杂志所登载的当时新闻报导及评论等，充实了“八·二三”大罢工的内容。为我党领导这次大罢工提供了依据。

当时由于我党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所有党的报刊杂志等都已停刊，至今，对当时有关这方面的党史文献还没有查到正文记载。只能靠当时其它报刊的报导和敌伪档案资料作为查证核实的依据。现就罢工性质及原因有以下史料记述：

一是当时“盛京时报”消息报导和评论连续提出此次暴动（罢工）事件实为共产党人所煽动已有二名被查究中；二是“庸报”所载：本溪湖事件之原因，‘十之八九系由赤化共产党之策动；三是“满铁时报”（昭和四年）对本溪湖煤铁公司八月的罢工，除工资要求外，至关重要是因赤露（苏联共产党）的煽动者（指我党地下工作者）数十名，潜入到本溪湖及奉天方面之所为。而日本国内的“国民新闻”也曾警告奉天军阀当局说：在满洲各地潜伏于内部借民众运动之机，搞秘密结社与劳动组合（赤色工会），莫不以扩大排日为其开始活动；四是杨宇霆默认本溪湖事件与共产党人领导相关联；五是一九三〇年十月抚顺总工会成立时，全总驻满洲办事处的代表，在会上致词中，提出“八·二三”大罢工教训时指出：“从前本溪湖的罢工给我们很好的教训，他们罢工了，没能积极起来坚持战，都回工房子里听着去了，日本兵便开机关枪扫射，打死二百多名工友，

罢工失败了。”

根据上述的资料，我们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透过这些材料，把它同当时社会历史现状结合起来，不难探求它的实质和规律，加以结论。所以，我们在对这一专题材料整理上，既不抱着所谓“客观主义”态度，又不是“照实记录”，是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全部材料加以鉴别与考证核实。最后我们认为：

“八·二三”反日大罢工，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其它“官宪”团体所领导，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孙林、石云二人直接组织、发动之下而发生的，它将成为我党工运史上的壮丽篇章。

同时，我们认为其它资料已基本齐全，主要史实已翔实准确，对“八·二三”反日大罢工的始末已经比较清楚，完全可以成为专题资料，作为征集任务而完成。

并将有关资料附后。

本溪市总工会工运史编写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

本溪湖煤铁工人反帝大风暴

——煤铁公司工人“八·二三”大罢工始末的综述报告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地处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割据统治下的本溪湖（中日合办）煤铁有限公司，爆发了反帝大风暴，公司上下四千五百多名中国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气势磅礴，高喊“杀鬼”的反日大罢工。

这次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领导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直接推动下，唤起了半殖民地下的本溪工人阶级的觉醒，为争取自由和生存权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不畏强敌和暴力，不怕流血牺牲，团结战斗，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大罢工坚持了七天，迫使日本守备队不得不撤出公司境内和释放被捕的罢工工人。公司当局对在罢工中被日本军警镇压死伤的中国工人发了抚恤金，对劳动工资制作了改动，提高了工人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

这次大罢工不仅使敌人在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失，而在政治上更是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使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进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把当时东北各地人民正在兴起的反日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罢工历史背景及原因

在中日合办名义下的本溪湖煤铁公司，中方以官股之名，实为地方奉天省府和以张作霖之名为股东。日方以大仓喜八郎财阀为其

股东。日本帝国主义有鉴中国当局用以地方军阀主办企业，就极力与奉系军阀进行勾结，企图在经济上得到侵略和扩张，在政治上得到对它的控制，所以积极扶植奉系军阀势力，进行穷兵黩武，大打内战。庞大的军费开支，直接地落在东北人民的头上，造成人民涂炭，家破人亡的惨状。

为了索取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军阀政府的挥霍浪费，奉张集团除对东北三省人民采取急剧增税加捐，大量发行“奉票”，向人民进行搜刮外，还大举内债，甚至不惜让民间种植鸦片，贩卖毒品，借以筹资。当时，连东北官银号的资金都被挪用一空，实际上在张作霖入关战争前，东北地区的经济已是达到极度枯竭。但为达到称霸北方、统治南方的野心，张作霖只好向日本“满铁会社”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借下大批外债。由此导致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资源的掠夺更加猖獗，使沿南满铁路线上的矿山被其无止境的开采，本溪湖的煤炭和铁矿是它主要掠夺的对象。

此时，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反奉战争的进行，推动了奉系将领郭松令倒戈反奉的积极作用，所以，在第二次直奉战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五卅”反帝运动在持续发展，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经巩固。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在广州由中国共产党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本溪湖煤铁公司派出张子言等二人为代表参加了大会。会上，通过职工运动的总策略，组织路线及其运用方法，经济斗争的近期目标和步骤等议案。与会代表特至广州国民政府，请愿出师北伐。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下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奉运动，使奉系军阀陷于各种势力包围之中，战争得以迅速进展，使奉军节节溃退。

趁此之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骤，从一九二七年六月至八月，日本首相田中义先后召开所谓“东方会议”和“大连会议”，策划侵略中国独占东北的罪恶活动。除加强经办“南满铁路”扩张经济侵略外，就是要对张作霖统治下的“满洲(东北)实行强硬手段”。在这两个会议之后，日本立即采取措施，乘张作霖掌握北京政权之机，向张作霖提出索取“满蒙”权益。要求要在东北修筑七条铁路；承认日本在东北有“商租权”和“营业权”，让日本资本家可自由地租借东北土地，任意地进行经济侵略。此外，日本还要求签订所谓“治安协定”和在临江等地设立日本领事馆。日本把这些要求写成备忘录，叫做“满蒙觉书”。

日本的要求，张作霖不甘情愿完全按照日本的意图行事，就以推拖或暂缓的办法，与日本人周旋。众所周知张作霖在未入关之前非依靠日本支持不可，入关后控制了北京政权，凭其实力，单靠日本的支持是不够的，况且日本对他的约束和压力越来越大，给他的教训是：靠日本的支持只能保住长城之外的地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本部的势力；受英美支持的军阀已经两次把奉系军阀从北京赶走。于是张作霖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争取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企图借“以夷治夷”。由于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帝浪潮，使张作霖不敢轻易公开答应日本的侵略要求。但日本帝国主义是急欲要达到侵略东北的目的，便向张作霖咄咄逼进，甚至阴谋要拆他在东北的老窝了。当张作霖连连收到奉(天)省当局的禀函文件，惶恐不安，急忙让杨宇霆会见日本公使芳泽，然后赶回奉天探听虚实。

当张作霖处于踌躇之中，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张作霖接受了杨宇霆的建议，要与蒋介石议和，放出“联蒋反共”的空气，喧嚷自己是孙中山的老朋友，一向是赞成

“三民主义”的。但又怕和蒋介石合了伙后处于下峰，当前得有本钱和地位，急于使北方各省统一名称，改用“安国军”政府的旗号，仿效孙中山的先例，称自己为“大元帅”，认为这样北方不单有半壁江山，还有“大元帅”。蒋介石也得在大元帅之下嘛！这是张作霖要与蒋介石勾结“联蒋反共”的伎俩来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

尽管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种子早在东北大地扎下根，在南、北满铁路沿线和矿山等工人集中的地方，已秘密的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并领导了东北各地工人运动斗争。大连中华工学会就是当年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领导了大连“福纺厂”“四·二七”大罢工。俟后大连工学会，就曾多次派人到抚顺、本溪湖、鞍山等处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组织工人罢工和暴动。

一九二七年反日的烽火在东北各地已燃烧起来，东北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和组织之下，实以不惜出于一战。各界人士和团体都请求拒绝日本的“满蒙觉书”。奉天各界还组织赴京代表请愿抗日救国团。在这种趋势下，张作霖为摆脱困境，转嫁国内外的矛盾，也好叫日本人知道东北现时所发生的情况，借以民众之压力，一使日本人理解张作霖的苦衷，二使日本人也好在东北民众爱国激情下就范些。

在这国内错综复杂的社会动乱的局面下，东北工人阶级，受到“五卅”运动的鼓午，于1926年大连“福纺”厂，举行“四·二七”千人百日大罢工，1927年5月奉天制麻会社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这两次大罢工，都是在我党领导下，掀起的大规模反帝斗争。与此同时，本溪工人阶级也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发生工人罢工达二十五起之多，有二十一次是发生在煤铁公司。罢工原因多是由于日本

人的政治压迫和暴行所引起的抗议罢工，从而加剧了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同年在“八·二三”之前，五月二十五日公司发电所全体工人抗议日本警察非法逮捕工人金宝柱、刘胜全二人诬陷偷盗严刑拷打，七月，本溪煤矿南山“大房子”中国伙夫，无故被日本人刺杀，激起全矿工人无比义愤，举行抗议罢工。在这种气氛下，久受日、张压迫的本溪工人，深感民族的危亡，身受其苦，渴求解放和自由，不惜一切奋起斗争。

正当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集中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之际，本溪工人阶级急需有人领导之时，孙林、石云（自称是抚顺直隶会馆——工会）二人，从抚顺来到本溪煤矿，先以工人身份深入工人当中，一边劳动开展工作，一边广泛的同采煤工人接触，交朋友，叙家常，了解工人疾苦和思想动态。启发工人提高阶级觉悟，面对外界社会上所发生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实例，向工人指明，这些都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和劳苦大众所不堪忍受下而奋起斗争的，从而进一步诱导和提高采煤工人的阶级觉悟，激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工人的强烈憎恨。经过孙林、石云二人的秘密活动，不但在工人中有了群众基础，并且从中发现和培养了四、五十名罢工骨干和一批积极分子。为举行大罢工，并同其它厂矿的联合行动，起了带头罢工的先锋中坚力量。

恰在此时，久受日本帝国主义控制和一手操纵下的“煤铁公司”当局，正为加强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一步对工人进行剥削和压榨，积极筹划改革“公司”的原有劳动工资制，把原规定给采煤工人每人每月固定的三元米贴费，作为采煤工人井下作业的伙食补贴而废除；予在这次改革后的新规定，要按下井工人采煤量多少来发给，凡是下井采煤的工人在当班作业时间内，每人达

到两车基本定额者，才能发给米贴费三元，对达不到这一定额数量的要减发。由于这一定额过高，井下劳动条件恶劣工人都难以达到这种定额。

另外，“公司”当局，无视工人疾苦，还减发了工人的津贴费。按照规定在发给工人的津贴费上，是以金票（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行的纸币）作为标准的，每月按照“金票”在市场上的行情涨落来核算发给工人。如：七月份“金票”平均数是十元六角一分，工人应得津贴费是三元四角六分；可是到了八月份市场行情有所变化，“金票”也随着这种变化略有下跌。八月份“金票”平均为九元五角二分，津贴减到三元零六分。这样，每个工人在八月份的津贴费，就比七月份少得了四角。可是八月份的物价不但一点没下降，反而又给工人增加了新的征税负担。显然，“公司”采取的两项改革，都是直接损害工人利益的勾当，由此，更加引起了工人的普遍不满和反对，罢工已成为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孙林、石云，分析了东北各地反日斗争正在持续发展，“打倒田中内阁”“反对临江设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抵制日货活动也广泛开展起来。针对本溪内外形势，认为时机已到，罢工条件已成熟，便同采煤工人中的核心骨干分子刘宰喜等共同商量，把这次罢工的经济要求与反对日人虐待、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结合起来，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在“公司”的代理人岩濑总办。发动工人，因势利导，有组织、有计划和统一行动的加以领导这次大罢工。孙林、石云二人并对刘宰喜指明：当本溪的罢工掀起后，抚顺、沈阳的工人，也将起来罢工支援本溪，民众也会声援。在刘宰喜等同意这样行动后，孙、石二人便把罢工时所提要求：“成立会馆（工会）、提高工资、实行“三八”工作制、不许

打骂工人等四项作为向“公司”当局的基本要求条件，刘宰喜等对此完全表示同意。

八月二十日，“公司”当局正式公布新工资制，工人对此反应强烈，怨声四起。为适应罢工前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便于八月二十一日晚，由孙林、石云主持，有刘宰喜等骨干和部分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针对“公司”新工资制和采煤工人的强烈反对，决定先派二名工人代表向“公司”进行交涉：尔后，即把这些条件写成标语，张贴在电柱上和工人容易见到的墙壁等处。由于这些内容，切中工人心愿，符合工人切身利益，赢得工人的支持。工人们怀着对“公司”如若拒绝要求，就和岩濑拚个死活。

工人代表的举动和标语的出现，使公司日方总办岩濑大为不安，预感到这里的反日斗争余波未熄，新的罢工又要复起，于是岩濑自恃大权独揽和背后有日本守备队及日警察等为其后盾，决定用高压手段，对工人所提条件一概拒绝，并扣留了代表。

岩濑在气急败坏之下，为部署对付工人罢工时的镇压手段，岩濑主持召开了公司有关方面的主要头头会议。他以“太上皇”自居，提出对工人绝不妥协，要持强硬态度，对鼓动和带头罢工的人要惩办；并给把头们下令，对直接参加罢工者，凡不听劝告的都要给予解雇，停发工资。倘若出现罢工，就让那里停业，以此来威吓回击工人。显然岩濑决心要与工人较量到底，毫无妥协余地。在这种敌对气氛之下，孙林、石云决意因势利导，抓住这个时机，定于二十三日，以采煤工人为主体的先锋军，举行联合大罢工。

罢 工 经 过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本溪湖煤矿采煤工人三、四百名，怀着久受压抑，疾恶如仇的心情，集聚在三坑口“灯房子”附近，刘宰喜等四、五十名骨干积极分子，按照孙林、石云的安排，都分散夹杂在工人当中。他们手持工具镐把缠着白布（白面袋布做的指挥旗），翘首等待借头班升井交灯，二班领灯的机会，孙林站在人群中一个土台上高声说：工友弟兄们，我们派代表向公司提出废除新劳动工资制度等的要求条件，遭到日方总办岩濑全部拒绝，还把工人代表扣留起来，贴出公告，要对工人停发工资或开除，采取报复行动，我们怎么办？刘宰喜等带头振臂高呼：我们要罢工！打倒日本鬼子……喊声四起，全矿各坑口工人闻声，向三坑口“灯房子”奔来，不多时，汇成了千人罢工队伍，就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罢工。

由于罢工的爆发点是从茨沟三坑口“灯房子”开始的，当时工人都是怀着阶级仇民族恨的心情，愤怒之下，便把“灯房子”门窗设备和室内办公桌椅等物统统砸毁。然后，罢工队伍有组织的登上了南山，坚持斗争，待命行动。

罢工的声势，虽使岩濑总办，大为惊慌失措，但他仍不肯听从中方纪应湘代总办的劝告，采取以往同工人谈判解决的办法，坚持要以强硬姿态，用高压手段，让工人屈服，马上复工，不然就停业，全部解雇。并派坑务课长陆世勋，外勤取缔系主任张书绅，次席田冠忠等人去南山向工人传达岩濑总办的旨意；同时，岩濑也在秘密同日本守备队等方面进行联系，关注罢工动态和必要时进入公司镇压工人的准备。

由于公司中日上层成员之间，为权势之争，存有积怨甚久的潜在矛盾。特别是当时东北民众处于反日救国运动声浪中，工人罢工斗争，也在此起彼伏。在这种政治气味下，不能不使这些知识分子，受到时代潮流的推动和民族意识的影响有所领悟。所以，当他们三人出当岩濑总办代言人的时候，对工人直述：“吾等为诸君要求工资之提高已非一次，然而，每为日方干部岩濑总办所坚拒，吾人处此情形之下，如以普通办法碍难达到目的等语”。在这种趋势下，孙林、石云等罢工领导人，认为利用公司当局中日上层干部间的矛盾和一切敌人的反对派都应争取和扩大工人斗争势力，是为当时罢工斗争所需要的，在策略上有利于罢工胜利的取得。对此，工人仍坚持原来所提条件，让岩濑速作答复，否则，罢工决不中止。

罢工处于互不相让，斗争矛头都已集中在日本岩濑身上。而岩濑的动向，如工人不屈服，就采取高压手段。这时岩濑所指的高压，无非是用日本武力来镇压工人。斗争处境很困窘，急需加强工人内部团结坚持斗争，同时要研究应变措施和进一步的行动。在陆世勋等人回公司向岩濑传达工人意见时，孙林、石云和核心骨干分子共同研究斗争策略。面对斗争形势的变化，当时出现两种意见：一是主张用大暴动的方式，提出直接先去夺取公司警察（矿井、守卫和守备队）的枪支，武装工人和敌人硬拚；二是根据公司中日上层矛盾和中方干部人员现时的态度，应争取倾向于工人扩大罢工势力，迫使岩濑答应条件。主张先把公司唯一大动脉——发电所破坏掉，断绝全市总电源，使熔矿炉断电、断水和炉体凝固（当时敌人控制太严没停产），迫使岩濑屈服。结果，认为前者冒险性大，不利于矛盾转化和自己势力的扩大。认为，后者是既有利于工人安全，又容易使条件的实现。最后，都同意采取后者办法，等候公司

回音再作行动。

此时，岩濑仍以“太上皇”自居，盛气凌人，再次，拒绝中方代理总办纪应湘等提出同工人谈判或在用中国警察弹压罢工的意见。他无视中国主权，借口保护日本在华资本和侨眷的生命安全为理由。坚决要用日本武力进入公司平息这次罢工。公然又命令贴出“公司不定期休业”的公告。然后，岩濑命用电话通知驻在连山关、奉天、抚顺等地满铁沿线上的日本守备队和警察等速来本溪应援，镇压这里罢工工人。早有准备的驻地守备队和警察已正在活动。显然，这场大冲突势必发生。

因为民族矛盾的激化，在对镇压罢工上，岩濑决定不依靠中国警察，单方用日本军警来镇压这次罢工。中方代理总办纪应湘和取缔系主任张子言（三次劳大公司代表）等，也都对中国警察提出告戒。要求他们“只是保护好取缔系事务所内的主要款项，而对于罢工工人的行动，务望不要加以干涉”。

晚七点，天黑后，除铁厂熔矿炉还在烟火通明外，选煤厂、耐火厂、炼焦厂等工人，也都在同一时间举行了罢工，结队走出了工厂拉上南山与采煤工人大会合。

七点二十分，以煤矿工人为主体的，手持各种镐、斧、棍棒等作武器，从山上分头向发电所、坑务科、炼铁厂、公司办公“小红楼”等奔去。在夜幕下，工人高喊：“打鬼”“杀鬼”等口号，此起彼伏。岩濑老鬼子，就在工人一片杀声四起声中，早已离开他的办公“小红楼”去调兵遣将。当工人到达“小红楼”时，遇上一个企图负隅抵抗的日本鬼子，从马靴筒里往外拔手枪，被工人高殿清发现，急步冲上去，猛击一镐把，就地打死，夺走手枪，接着又去冲击鬼子的宿舍。